

龙——由图腾崇拜到皇权象征

王楠毓 张孟祥

原始社会时期,每个氏族及部落以某个自然物作为本族的标志,称为图腾;而每个成员都得承认自己和图腾有特殊的血族关系,并对此加以崇拜,即为图腾崇拜。

原始人之所以会对图腾进行崇拜,原因在于:原始人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生存斗争时,逐渐发现有少数自然现象与自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如在饥寒交迫的时候,某种动植物往往为自己提供了急需的生活资料,使人们对它有一种亲切的感激之情;或者因某种凶悍的动物给人带来致命的威胁,人们对它无比畏惧,诚惶诚恐。在当时超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们把上述自然现象看作是与自己生命攸关的神灵,从而产生了图腾信仰。每个氏族选择作为本氏族图腾的崇拜对象,往往是与各个氏族的生产和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或无生物。在我国古代,传说“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大禹氏以龙纪”。少皞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的就是一些主要部落集团的图腾情况。

在远古时代的众多图腾崇拜中,我国先民对蛇和龙的崇拜尤为突出。这主要与原始先民在险恶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生存斗争时,蛇和龙密切联系着他们的生活生产有关。

对蛇,《说文解字》的训释是:“蛇,从虫,它声”。对“它”又注说:“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上古黄河流域一带气候比较温暖湿润,蛇喜温湿,自然也很多,所以上古人见了面相互问候:“没有遇上蛇吧?”蛇常常在人们不经意中发动袭击。被毒蛇咬一口,人很快就会死去。先民们对此既感恐惧又无可奈何。在他们心目中,蛇不仅凶残,而且狡滑。它没有四肢,却能飞快地爬行,它身上的鳞片组成各种花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却又那样冷、那样滑,极难逮住制服它。这一切都给人以不可理解的怪异的印象。同时,这蛇还与先民的生产、生活的气候有关。据《山海经》中记载:每当浑夕之山的肥遗蛇、锻于毋逢之山的大蛇、鲜山鸣蛇出现时,则该地区大旱;而阳山化蛇出现时则该地区大水。于是,蛇在先民的心目中逐渐被神化了,他们

或学蛇行,或文蛇纹,或敬蛇或娱蛇,想借此博求蛇的保护,并称自己为蛇的后代。于是,蛇图腾的崇拜就出现了,据《山海经》、《淮南子》、《汉书》、《说苑》、《说文》等典籍记载,古代以蛇为图腾的氏族相当普遍。

对龙,《说文解字》释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载说:“龙,水物也。”据文籍记载和有时见诸报端的有人所见之龙的生物形体看,龙与蛇很相近,因此在先民眼中,龙、蛇往往相混或所分不明。由此才有了“龙蛇”或“蛇龙”之称谓。龙和蛇在汉人眼中是有“亲缘关系”的,今人还习惯于把十二生肖中的属蛇称为属小龙。闻一多在《伏羲考》中就说:“龙的基调还是蛇”。于是对自身和动物的界限还不甚分明的原始先民们就以蛇为核心,又糅合其他动物的一些特点,从而神化出图腾的“龙”。据文物发掘得知辽宁红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均出现了龙的形象。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45号大墓,墓室中间所葬一壮年男性,其骨架两侧也用蚌壳精心摆塑着龙、虎图案。这些说明我国关于龙图腾确有其事。

图腾“龙”是想象中的动物,它兼具蛇、兽、鱼多种动物的形象特征,又是先民们以蛇为原型想象出来的灵物。《洪范·五行纬》就说:“龙,虫之生于渊,行无形,游于天者也”。《淮南子·天文训》说:“龙举而景云属”。《管子·水地》又说:“欲小则化为虫,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这种灵气十足、神气活现的神龙,乃是华夏先民崇拜的图腾。

这龙图腾兼具多种动物的特征,说明华夏族乃是各有图腾信仰的多民族的融合。而它的变异又有一个漫长过程。图腾专家(如宋兆麟)说:图腾是与母系氏族同时产生的并且随着氏族的发展而发展。当一个氏族发展为两个以上氏族时就变化为胞族图腾。氏族部落兼并时,胜利的部族又吸收了失败部族图腾的某些特征而丰富自己的图腾形象。据1992年第一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所载李耀宗的《黄帝一龙有新说》讲:黄帝作为历史存在的特定身份和地位,不可将其视作某某确指的个人,或虚幻臆构的仙神,而应把

它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承认它包蕴着多层涵义:(1)黄河中下游的一个特大特强的氏族部落。(2)黄河流域若干氏族部落的联盟集团;(3)上述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若干代首领的总和或其共用名号;(4)上述若干代首领中最为功德高远的里程碑式的人物。黄帝战败蚩尤,一统中原后,作为当时的最高“人王”,尽力安抚归附其下的大河上下的广大部落,毅然改少典氏的“熊”图腾作为“龙”图腾。黄帝母族为有蚺氏。“蚺”即蛇,古又通“桥”。古传黄帝葬桥山,可见黄帝崇奉母族图腾。“龙”正是意在集中父族“熊”图腾之兽头,与其母族“蚺”图腾之蛇身为一体。这个奇特的象征性集合体,蓄涵着母、父系氏族社会演进交替之历史底蕴,自此而成为中华民族世代尊仰的始祖图腾——龙。这种事实正反映了一些部族结合、民族同化的进程。

华夏族的历史,传说从“三皇”、“五帝”开始,之后就是“三代”——夏、商、周(周又分西周、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二阶段)。在春秋战国之际,“华”、“夏”和“华夏”作为民族的名称正式见于史籍。

古代有些学者认为当时众多氏族部落中,有熊“国君”少典和有蚺氏氏女结婚,生炎帝和黄帝,他们的后裔子孙繁衍发展为华夏族。虽然这个故事经过许多学者考证研讨,指出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但从传说时代到文字启示,一直流传下来。按《史记》、《国语》等史籍整理的远古历史。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亦即华夏族,均出于黄帝,可列为以下简表:

- 表一: 少典 炎帝 (姜姓)
 黄帝 (姬姓)
- 表二: 黄帝 玄囿(青阳)—蚺极—高辛(帝喾)
 昌意—高阳(颛顼)
- 表三: 高辛 弃(后稷,为周代先祖)
 契(为商代先祖)—
 帝挚
 放勋(唐尧)
- 表四: 高阳 鲧—禹—启(为夏代先祖)
 称—老童(卷章,后嗣为楚君先祖)
 穷蝉—敬康—句芒(句芒)—桥
 牛—瞽叟—虞舜

华夏族的远古历史,上面仅描述出了概略情况,当然不能全盘肯定,但也不能全盘否定。

作为一个民族,始终都在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增殖裂变,有时同源异流,有时异源合流。华夏族也不例外,按上列表格,似乎华夏族的夏、商、周三代出于一根,为同源异流;但作为三个不同的共同体,他们各有自己活动的基本地域,各有自己祖先历史的传说,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生活,各自的经济水平也有差别,即使三代出于同源,在一两千年的演化中,难免量变和质变;如果按层累造成和渗透融合观点解释以上表格,可能更为适当。

华夏族在三代时期及其以前,显然存在许多民族部落或方国,所以古代有“诸夏”或“诸华”一词,其中

以夏、商、姬、姜(即活动于大河上下的部族)四个共同体或族系的史迹最为丰富。他们之间也有一个渗透融合的问题。长期的通婚、战争、结盟、通商等交往的过程,既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又是一个渗透融合的过程,他们的社会生活诸方面渐趋一致,形成一个古代民族——华夏族。“夏”的得名,显然与夏王朝的建立有关,古人解释“夏”为“大国”,乃自称美名;周人往往自称为“夏”,历史上有“周人尊夏”的记载。至于“华”名,似由一望可辨的服饰而来,和披发左衽不同,夏人冠冕博衣大带采饰,古人解释“冕服采章曰华”,亦当为自称美名。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就是以夏商周三代为核心的华夏文化。

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除与“诸夏”进行渗透融合外,还和杂居的以及周边的异族渗透融合。他们之间在文化上、血缘上、社会上、经济上、政治上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异族,古代泛称为夷、蛮、戎、狄,或统称为夷、四夷。他们在最初和华夏有显著的区别,正如戎人自己所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看来,夷蛮戎狄诸部与华夏之间,饮食、衣服、言语均不相同,这正是不同族属的共同体之间应有的现象。

东周时期,各族矛盾统一的进程,日趋激烈,当时人们提出“夷不乱华”。“裔(按即夷)不谋夏”,应当“用夏变夷”。“蛮夷猾(乱)夏”是当时社会上的严重事件,当时最有威望的政治家是能够“尊王攘夷”的人。当时一方面有华夷的区别,或称为“严夷夏之防”;但另一方面,对这类区别并不绝对化,而是采取灵活方针。从个人讲,三代时期不断地出现四夷人华夏化;而华夏人也不断地有四夷化的现象;至于整个氏族部落的渗透融合,史迹斑斑可考。所以古人总结为:“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进于夷狄则夷狄之”。“不论民族是谁,只要接受中原华夏文化,就是华夏族人;即使中原华夏族人,只要接受四夷文化,也就不是华夏族人,而是四夷人了。”

西周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王畿、齐、秦、晋、楚等诸侯国土以内,杂居了许多夷蛮戎狄部落,到战国时,除去四周边区以外,绝大部分均融合于华夏族中。汉代的学者明确提到这一历史的现象:“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衣关(贯)头,今皆夏服”、“古之戎狄,今为中国(按融合为原华夏);古之裸人,今被夏服”。中国古代历史,从民族史的角度讲,应该说就是一部众多共同体相互渗透融合的历史;虽然各族之间常有战争发生,但融合的主流,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历史之中。

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开始,夏商周三代贯穿其中,标志古代文明重大成果的事物,如国家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城市、宫殿、王陵的兴建,高度发达的青铜制造冶铸业,以及铁器、礼器、兵器、玉器和商业贸易等,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均居于周边地区的前列,并有向周边民族传播的史迹,以华夏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夏商周“共主”的政治国家,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均属于当时“天下”的高峰。所以我们说,黄河流

域是中华民族摇篮；华夏族是当时各族最先进的、文化最高的民族。

《易传》对鬼神的崇拜和祭祀(亦即图腾崇拜)是出于一种恐惧的心理感情和为获得“吉福”、“天下服”的功利目标。而图腾龙的强壮有力的威武和广大无边的神通,则反映了华夏先民对天神的敬畏和经天纬地的美好愿望。因此,我国远古时代的许多神话人王大多与龙有关。据《帝王世纪》记载:炎帝是女登与神龙接触而生,黄帝是附宝见大电绕北斗而生,尧是庆都感赤龙而生,舜是握登见大虹而生。据出版《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的作者何新考证,这“大电”、“大虹”亦是先民心目中的龙。至于颛顼,典籍中虽未见有龙生龙化的说法,但说他生前曾“乘龙至四海,死后葬所亦有“四蛇卫之”的论载并非仅有。对华夏民族关系更直接的黄帝和禹帝,说他们与龙有密切关系的典籍更多。《史记·天官书》说:“轩辕,黄龙体”。《吕氏春秋·古乐》记黄帝“令飞龙作效八风之章,名曰承云”。(按“承云”乃黄帝之乐)《古今注》:“皇(黄)帝乘龙上天”。《封禅书》集解:“黄帝采首山铜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淮南子·天文训》:“中央土地……其帝黄帝,其兽黄龙”。《开元占经》引《春秋河图》:“黄帝将亡则黄龙坠”。凡此都证明了黄帝与龙有极其特殊的关系。鲧禹父子也是远古神话中与龙有密切关系的神。《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启筮篇》曰:“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这段话在《初学记》和《路史》等书中,末句不作“化为黄龙”而为“是用出禹”。这就又透露出两点信息:一、鲧治水失败只能为鱼而不能称龙;二、禹或为龙生,或本身就是龙。这些或龙生或龙化或操龙或践蛇的神话人王,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自然要发挥超人的神力,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成为古史传说一个又一个大帝,并构成了代代相承的古帝系统,开辟了中华大地,构建了华夏民族。

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和氏族社会的瓦解,中国先民逐渐减弱了对蛇和龙的恐惧,龙逐渐演变成了氏族贵族以及后来帝王通天的工具和权力象征。传说在帝项颛时,他借口“古者民神不杂”,由于“九黎乱德”,弄到“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使神灵“无有严威”。于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在帝尧时,他以“苗民弗用灵”为借口,出兵征伐三苗,所谓“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所谓“南正重”,当是善于观察天象通晓巫术的巫师之类的人物。从此他们就成了管理与天神有关事宜的专职人员,表达天命,显示神灵,就成了他们的特权,这就形成了控制广大黎民群众灵魂的宗教职能。他们为抬高自己的权威,还有意大力宣扬“君权神授”的天命论。《诗经》中的“颂”不少是反映这一内容的。《周颂》就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周颂·昊天有成命)、“有命自天命此王”(大雅·大明)。而广大黎民群众只能在“火正黎”之类的部落首领人物的监督管理之下,在田间劳

作,不准“侵渎”天上的神事。天与地的隔绝不通,神事与民事的截然分离,实质上反映了阶级关系的对立日益加深,标志着国家权力和政府机构的萌芽。

那么统治阶级凭借什么来通天呢?这便是龙。《山海经》中乘龙天神非一二数,四方之神亦均乘龙。《大荒西经》记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嫫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夏启之所以能三度宾于天帝而得九奏之乐也,在于龙成了他通天的工具。这里已经透露了龙已从众神之装饰逐渐转为帝王之标志的信息。

经过“绝地天通”的神权垄断,夏、殷、周奴隶主信奉的天神(上帝)就与宗祖神相结合,而具有了氏族宗教的色彩。当然,秦及汉初的统治者,仍奉祠王帝及山川百神。不过秦汉之际的方士儒生,却极力要在五帝、诸神之上塑造一个至上神。想让这至上神与人王的宗祖神扯上“亲缘关系,从而使人间帝王神秘化。这儒生方士的想法术道正是演用了而今已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模式。帛书《系辞》说:“天尊地卑,贵贱位矣”,《庄子·天道》篇亦载:“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臣民百姓自是地上的浊物,如若天子帝王能与天神扯上关系,不就成了神明、神圣了吗!何况我国古代早就有许多感生神话(如《帝王世纪》所记述)并由先秦古籍如《春秋公羊传》总结的那样“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呢。于是到汉武帝完成封建大一统,奉祠在五帝之上的“太一”神就面世了。(见《史记·封禅书》)。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天人感应”论,正为“太一”这一地下主权在天上的投影的至上神作了神学论证,它系统地阐述了神权和王权的关系,为汉武帝的造神运动及其政治意图,提供了哲学——神学的理论根据。自此之后,帝王系天神作用而生,龙亦完全成了皇权的象征,一直沿用到清。

华夏族的祖先,如前所述,当是黄帝、炎帝。而炎黄二帝与龙的关系又如上所述是那样的密切、直接。因此把伦理视为文化底蕴极为重要内涵的华夏族人,自然就极为崇奉他们的先祖崇奉龙了。“龙为贵”的观念当然也就顺理而成立了。所以有文字记载的历代帝王也都愿意把自己的出生与龙联系起来,借虚构的神化了的龙来炫耀自己的身世,形象地宣扬“君权神授”的封建观念。同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又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谁在生产关系领域居于统治地位,谁就必然要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居于统治地位。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就是它所统治那个社会阶段的全民的指导思想的经典解释。历代奴隶主和各朝封建帝王,既然那样热衷于宣扬龙的神圣、尊贵,广大臣民自然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龙为贵”的观念而尊崇龙了。只不过百姓对龙的尊崇有其更丰富更美好的内涵(如:崇奉威武、乞盼吉祥)罢了!